

生态人类学视角下贵州喀斯特生态农业探究

罗传维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27日

摘要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石漠化问题突出。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下, 生态农业的介入正深刻改变着当地传统的生计方式, 推动其由单一、粗放的种植模式向多元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型。从生态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出发, 生态农业不仅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强化了社区共同体的协作机制与集体行动能力, 成为西南地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与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 为西南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贵州经验”。

关键词

生态人类学, 喀斯特地区, 生态农业, 传统生态知识, 社区共同体

A Study of Kars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huanwei Luo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February 25, 2026; accepted: March 18, 2026; published: March 27, 2026

Abstract

The Karst region of Guizhou features a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inent rocky desertification, yet it is endowed with rich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riven by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forces,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local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It has promoted the shift from a single, extensive planting model to a diversified, ecological modern agricultural model.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become a key pathway for coordin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It provides important "Guizhou Experi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in the southwest.

Keyword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Karst Regi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Community Solidar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1]。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问题突出，但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自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生态农业的介入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居民生计方式已发生显著转变。当地群众利用独特的自然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了由传统粗放农业向生态友好型农业模式的转型。生态农业的发展成为喀斯特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石漠化治理和实现生态宜居的重要举措，为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贵州样本。本文就生态人类学视角下，对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探析。

2.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与人文概况

贵州地处喀斯特高原核心区，地貌以石峰、洼地、溶洞为主，地表破碎、土层浅薄、水源渗漏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且敏感，易发生石漠化与旱涝交替。在此自然约束下，当地各族群长期形成了以家庭为单元、多样化镶嵌式种植与生态循环养殖为核心的传统生计体系，并通过乡规民约、民俗仪式等承载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由此，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区域农业结构与生产方式，而各族群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文化实践又反过来维系着脆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生态-人文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整体格局。

(一) 生态人类学的核心内涵

生态人类学聚焦人类群体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向互动、共生适配，核心是探究人类生计方式、文化制度、伦理观念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与改造机制，以及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形塑作用。其要义在于打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人类文化是生态适应的产物，传统生计、生态知识、族群习俗均是人与自然协同演化的结果，旨在揭示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关联，为解读区域生态-人文共生格局提供理论视角。

(二) 贵州喀斯特地区人文生态

贵州作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最核心的省份之一，贵州生态环境屏障凸显脆弱性又具有生物富集的鲜明特征。世居于贵州的各民族群体，在长期适应喀斯特环境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丰富的传统生态认知和具有地域适配性的农耕智慧[2]。从地理角度来看，贵州喀斯特地形总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以上，其中石漠化面积占比突破20%，这一独特的地形结构使得生态环境高敏感性，同时也导致经济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态势。近年来，依托发展新型生态农业，成功推动生产模式变革，实现了单一性传统

经济作物转向特色培育种植、林下空间种植、生态绿色养殖等多元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构建了“山顶育林、山腰种果、山脚产粮、山下养殖”的山地垂直空间农业模式，其核心是遵循喀斯特地貌山顶到山脚的特殊互补布局，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步摸索出一套以生态修复为根本前提、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能够实现经济价值、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遗产协同并进的成熟发展范式，为喀斯特脆弱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贵州喀斯特区域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气候温润舒适，冬天无凛冽严寒，夏天也没有闷热酷暑，整体水热组合条件较为优越，年均降水量大致在 1200 至 1400 毫米之间，常年平均气温保持在 14℃到 16℃之间。但这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却有明显短板：地形支离破碎、地表崎岖不平，再加上土层既浅薄又贫瘠，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不足，使得整体生态系统呈现出较强的脆弱性。世居在此的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世代都一直以农耕作为主要生计，但受制于严苛的自然禀赋，传统农业技术的革新与发展长期受到阻碍。为了适配这样的生存环境，当地慢慢形成一套以适应环境为核心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3. 喀斯特地区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与智慧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深刻揭示了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山地集约农耕型，并兼具刀耕火种与梯田稻作的特点[3]。在长期适应喀斯特环境的过程中，当地民众形成了以“适应当地、循环利用、多样种植”为特征的传统生态农业智慧。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辅以家庭养殖、手工编织及采集等，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计复合体。

(一) 适应性农业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传统农业，一直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当地农民凭借对喀斯特微地貌和小生境的精准了解，搭建起镶嵌式的多样化种植体系。在岩石裸露的石芽地，他们会选择种玉米、小米、荞麦这类耐旱耐贫瘠的作物，这些作物根系发达，能在石缝的零星土壤里扎根生长，刚好能把有限的土壤资源利用起来；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岩溶洼地，农民们会开垦小型梯田，借着汇集的雨水或山泉来种植水稻，也就形成了喀斯特山区独有的“岩溶稻田”景观；在坡度较大的山地，他们就采用“林-粮-药”间作模式，种上板栗、花椒这类经济林木，林下间作板蓝根、黄精等中药材，或是套种红薯、大豆等杂粮。拿具体的实践来说，黔西南州贞丰县的布依族聚居村寨，在面对石漠化问题突出的石芽坡地，当地百姓摸索出“玉米+黄豆”的套种栽培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玉米秆能当黄豆生长的天然支架，而黄豆根系的根瘤菌具备固氮作用，能有效改善坡地土壤的肥力条件，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有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也实现了石漠化坡地的土壤改良。

另外，在村寨里的岩溶洼地梯田中，村民还搭建起“稻鱼共生”的简易生态种养体系：稻田里的鱼能捕食田间杂草和有害虫类，鱼的排泄物又能变成水稻生长需要的天然养分，这种模式不用依赖化学农药和化肥，就能保障稻田作物稳定产出。这类种植模式，其实是喀斯特地区农民对生态环境的主动适应。喀斯特地貌的土壤本就浅薄且分布不均，气候还常出现干旱和洪涝交替的情况，传统农业靠着多样化种植，既规避了单一作物种植的风险，又把土地资源利用到了极致，实现了“地尽其用”的生态生计策略。就像马廷中在《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中所揭示的传统农业生态的适应逻辑那样，贵州喀斯特地区农民的种植智慧，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与环境共生的生存策略，这种策略虽受生产力限制，产量不算太高，却维系住了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为生计当地的安全筑牢了根基[4]。

(二) 循环养殖业

这一地区传统养殖业，主要以牛、猪、鸡、鸭这些畜禽为核心，不仅规模小还很分散，基本是为了满足家庭日常消费和辅助农业生产，未能成为经济支柱产业，但却模式出了“养殖-粪污-果园”的生态农业循环模式。牛在农耕里是的关键的动力来源，要承担犁地、运输这类重体力劳作任务；猪和家禽为

家庭提供肉食，它们的粪便则会被收集起来，腐熟之后施到农田或林地里，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料。这种特点在都匀市罗甸县生态循环种养殖基地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当地农户会把养殖场的牛粪，先做干湿分离处理、再经过高温发酵，制成稳定又无害的有机肥，专门供给给周边果园的果树，为果树生长提供天然养料。当地农户还积极发展林下养鸡，鸡群在山林间啄食杂草害虫，这些畜禽排泄粪便又能直接滋养山林植被，由此形成了“鸡护林，林养鸡”的生态闭环。这类循环模式，其实藏着喀斯特地区农民朴素的生态资源观念[5]。喀斯特地貌的土壤肥力就低，想从外部输入肥料相对困难，而牲畜粪便的循环利用，既解决了土壤肥力不足的难题，又减少了养殖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最终形成了种养联动的生态闭环。从生态人类学角度看，这一循环体系是当地居民对资源稀缺性的回应——通过内部资源的循环再生，降低对外部系统的依赖，在维系喀斯特生态系统稳定的同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正如林耀华在《民族学通论》中提到，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模式始终以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核心，形成与地域生态相匹配的经济文化类型，强调人类生计行为必须与生态承载力相契合，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与社会再生产的统一[6]。这种循环养殖模式是喀斯特地区人与自然互动的典型范例，彰显了当地居民利用生态规律、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智慧。

4. 现代语境下生态农业模式的变迁与转型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正因为政策扶持与市场经济驱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2008年以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落地，生态文明建设也在持续推进，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生态补偿、石漠化整治、特色产业扶持政策等利好政策，给生态脆弱区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介入，不光改变了过去传统分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还重新重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当地生态农业从单纯维系生存的供给模式，转向了兼顾生态保护和增收的双向价值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农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7]。

(一) 从“生计型”到“效益性”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渗透和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慢慢从“生计导向”转向了“效益导向”，在守住生态适应性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经济收益的规模化提升[8]。这种转变，打破了农户长久以来的生产经验逻辑，过去，农户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生产和生活的辐射范围涉及面较窄；如今，农户生产开始对接外部大市场、核心目标变成了获取可观又稳定的经济收益。农业生产的目的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为满足自家口粮而种地”的自给自足模式，转变成“跟着市场需求来精准生产”的商品化模式，传统的适应性农业也由此升级为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现代化生态农业。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不少喀斯特地区开始借助当地独特的地貌景观与传统农耕资源，打造一体化的“喀斯特生态农业观光园”，把世代传承的梯田耕作系统、稻鱼共生模式这些传统农业形态，转化成有旅游价值的特色景观，搭建起“农业 + 文旅”的复合业态。以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来说，这个村子靠着村内成片分布的岩溶洼地梯田，还有传承多年的稻鱼共生农耕系统，成功建成了复合型生态农业观光园区。园区里既有原生态景观观光、民族民俗展演，还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农事。在完整保留传统梯田耕作技法的前提下，塘约村还专门设计了“梯田插秧研学实践”“稻花鱼季限定捕捞”“古法稻谷脱粒体验”这些沉浸式农事项目，让到访游客能够全程参与从秧苗培育到谷物收获的完整农耕流程，直观且深刻地感受到“稻鱼共生”模式里藏着的生态农事智慧与乐趣。

农户的增收路子也随之变得多元，从过去只靠卖粮食作物的单一途径，拓展成了多维度的收益体系：既能通过景区门票分成、现场售卖生态稻米和稻田鲜鱼拿到直接收入，还能靠着园区配套的农家乐、乡村民宿这些业态实现长期稳定增收。据当地村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从这个生态农业观光园投入运营后，参与项目的农户人均年增收已经超过 3000 元，有些经营民宿和特色民俗餐饮的农户，年收入增长幅

度甚至突破了万元。研究所涉增收数据有效性与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 仅能反映局部试点区域的短期效益。塘约村的这一实践, 成功让当地传统生态农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 转型为“农业 + 文旅”深度融合的效益倍增模式, 也为喀斯特地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提供了一套值得推广的实践样板。

(二) 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化转型

喀斯特地区的农业转型, 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抛弃, 而是把本土积淀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技术、制度、市场这些新要素做创造性结合。喀斯特地区作为多民族长期聚居的文化场域, 世居在这各民族群体, 在千百年适应独特岩溶地貌与脆弱生态环境的互动中, 逐步摸索出一套与当地环境高度适配的传统生态智慧体系, 这套体系里, 既包含具体的农耕技艺、养殖模式, 也涵盖着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乡规民约, 不仅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构成, 更成为现代生态农业模式创新的“文化基因库”, 为区域农业转型提供了深厚的本土支撑。

从传统生态知识的变迁脉络来看, 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传统农耕时期, 这些生态知识多以口传心授、民俗仪式、乡规民约的形式存在, 知识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本民族村落内部, 应用场景仅聚焦于小范围的生计保障。比如苗族的“封山育林”古训, 最开始只是以寨老口头告诫、宗族族规来约束村民的山林砍伐行为, 核心目的是保障村落的薪柴供应与水源涵养; 布依族的梯田蓄水与稻鱼共生技艺, 也只是农户基于经验总结的农事技巧, 只用来保障自家稻田的稳产与土壤肥力; 彝族的“轮歇耕作”制度, 是为了应对喀斯特土壤贫瘠的问题而形成的耕地休养模式, 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与规模化应用。这一阶段的传统生态知识, 有着有明显的经验性、零散性与封闭性特点, 知识的传承依赖代际间的手把手教学, 且难以突破地域与民族的边界。进入近现代融合期, 随着外部农业技术的初步传入, 传统生态知识开始出现初步的融合性变迁。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化肥、小型农耕机械等要素进入喀斯特村寨, 部分农户开始尝试将传统粪肥还田与化肥施用结合, 将牛耕梯田与小型农机耕地结合, 传统生态知识的纯粹性被打破, 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技术指导, 这一阶段的融合多呈现出无序性特征, 甚至出现部分村寨因过度依赖化肥而导致土壤板结、石漠化加剧的问题, 传统生态伦理也因短期经济效益的诱惑而出现松动。直至当代转型期,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推动下, 传统生态知识摆脱以往零散、无序的状态, 逐步走向规范化、市场化与科学化转型, 在与现代社会需求深度对接的过程中实现价值重构。传统生态知识在当代实现的系统性转型, 并非简单延续或被动替代, 而是沿着制度转化、市场适配、技术融合三条路径有序展开, 使其在保留民族生态智慧内核的同时, 真正适配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需求。

其一, 制度转化层面。传统生态伦理与乡规民约逐步转变成规范化的现代生态管理制度。像苗族传统的“封山育林”古训, 现在已经演变为村寨层面的《生态保护公约》, 明确划定生态公益林与农业生产区的边界, 还制定了严格的山林砍伐与植被恢复制度; 布依族“祭山节”中保护水源、禁止滥伐的民俗仪式, 也转化为常态化的生态管护巡查机制, 由村民自发组建的管护队定期对辖区内的山林、水源与农田进行巡查, 能及时制止和教育违规使用农药化肥、破坏山林植被的行为[9]。这些制度把传统生态伦理的软性约束转化为硬性管理规范, 给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二, 市场适配层面。传统生态知识的应用场景开始对接市场化需求, 实现了知识价值的经济转化。过去苗族的传统手工竹编农具只用于农业生产, 现在村寨合作社把竹编工艺开发成了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文创产品, 结合农耕文化故事进行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 布依族的传统“五色糯米饭”制作技艺, 也从节庆食品变为观光园的特色旅游餐饮, 通过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运营, 成了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这种转化让传统生态知识突破了只保障升级的单一功能, 具备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增收的双重价值。

其三, 技术融合层面。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深度耦合, 完成知识体系的迭代升级。彝族轮歇耕作、苗族林下种植等传统模式, 结合现代土壤改良、生物防治、节水灌溉技术, 升级为生态循环农耕体系; 布依族稻鱼共生技艺, 融入良种选育、生态种养标准, 摒弃粗放经验,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

学种养模式。同时借助科普宣讲、数字教学等方式,打破口传心授的局限,让零散经验系统化、封闭知识普及化,既保留传统生态智慧内核,又契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实现生态保护与生产增效的双向共赢。

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要素的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人与自然协同适应”的传统生态伦理核心,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被破坏,又推动生态农业实现了从单一生产功能,升级成了兼顾生态保护、经济增收、文化传承的多元价值模式,这成为喀斯特地区统筹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践路径,也为全国同类生态脆弱区的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

5. 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动因探析

(一) 自然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是决定当地生态农业模式多样性的先天条件,核心原因在于环境异质性对农业生产形成的硬性约束,而人们为适应这种约束,又开展差异化生产实践,最终推动适应型生态农业模式分化[10]。从环境异质性的具体表现来看,该区域异质性贯穿地质、土壤、水文、气候等多个维度。地质层面,以石灰岩为主体的岩层经长期流水溶蚀,形成峰丛、峰林、洼地、溶洞等复杂地貌,不同地貌单元土地利用难度差异显著——峰丛洼地地势封闭,易积水但排水不畅;峡谷地带坡度陡峭,土地碎片化严重;河谷阶地相对平坦,却受河道变迁影响较大。土壤层面,喀斯特地区土壤形成速度慢、厚度薄,且分布呈现斑块状特征,同一村寨周边可能同时存在壤土、黏土与石渣土,土壤肥力与保水保肥能力差异悬殊。水文和气候层面,这片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虽然能达到1100~1300毫米,但降水大多集中在夏季,很容易引发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冬春季节降水又特别少,再加上喀斯特地貌地表水容易渗漏、地下水难开采的特性,干旱就成了常态。而且不同海拔区域的干旱频率和程度也有明显差异——海拔1200米以上的山地,因为气温低、蒸发量相对小,干旱的影响会缓和一些;海拔8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虽然气温高、作物需水量大,但因为靠近水源,应对干旱的能力更强;夹在两者中间的丘陵区域,既没多少水源支撑,又要面对较高的蒸发量,干旱风险是最高的[11]。这种多维度的环境异质性,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因地制宜的硬性要求:要是忽略区域差异,用统一的农业模式来生产,要么会因为资源不匹配导致产量低下,要么会因为超出生态承载力而引发环境破坏[12]。所以当地居民在长期实践中,就围绕资源适配和风险规避这两大核心,摸索出了差异化的生态农业模式。

(二) 文化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是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各个民族在千百年适应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沉淀出了一套传统生态智慧体系。这套体系里既有具体的生产技艺,也包含独特的生态认知和文化规范,它不只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更是驱动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深层文化动因。而到了现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新”,又让这份智慧突破了时空限制,衍生出了适配不同需求的生态农业模式。

各民族传统节庆和仪式里蕴含的生态观念,不仅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通过代际传承,把生态保护意识根植到了日常生产生活中。除此之外,地方性知识体系里的农耕经验、资源管理方式以及灾害应对策略,也为生态农业模式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这些文化要素在现代技术和市场机制的介入下,被赋予了新的表达形式和功能价值,既保留了传统的生态伦理内核,又融入了对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考量,也就推动了生态农业在文化层面的创新与延续。

(三) 市场动因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现代产业形态不断渗透,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需求从过去满足基本温饱,转向追求生态品质、文化体验和多元功能,市场渠道从本地零散交易,拓展成了线上线下全域覆盖,这种变化成为驱动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核心经济动因[13]。本质

是市场通过需求牵引与渠道赋能，引导生态农业突破传统单一生产的局限，衍生出适配不同市场场景的模式，从而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精准对接。从消费需求升级的维度看，市场对生态化、特色化、文化化农产品的需求激增，直接推动生态农业模式向精细化、差异化方向分化。其中一方面就是，生态有机需求催生有机认证型生态农业模式。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重视，喀斯特地区因工业污染少、生态环境优越，得此机会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的天然优势区。

(四) 政策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模式能多元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层面政策的系统引导与支持。这片土地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区，也是乡村振兴重点区域，长期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双重目标。而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针对性政策，通过资金补贴、技术扶持、结构调整、制度保障等手段，给生态农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红利。从政策导向的变化来看，不同时期的核心政策侧重点不同，也直接推动生态农业模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早期主要以生态修复为优先，催生生态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专门针对喀斯特地区陡坡耕地过度开垦导致的石漠化问题，通过粮食补贴加种苗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户把25度以上陡坡耕地退出种植范围，转为林地或生态用地。在产业扶持方面，贵州省出台《生态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对符合生态要求的有机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农业等，都给予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形成互补，贵州省在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时，结合喀斯特地区实际出台《喀斯特山区生态农业发展专项方案》，针对不同地貌类型，明确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重点。

6. 生态农业转型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塑

在乡村发展的漫长历程里，生态农业的兴起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村落的发展轨迹。有些南方生态农业示范区，过去一直以传统粗放型农业为主，村民们生计来源较为单一，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也造成了一定的生态压力^[14]。随着生态理念的慢慢深入人心，再加上市场需求的转变，才渐渐走上了生态农业转型之路，这一过程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对整个社区共同体的全新重塑。

其一，生态农业转型先推动了社区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在过去，村民都是各干各的，种植农作物均以传统为主，经济效益难以获得明显提高，彼此间的经济往来也相对较少。转型之后，村民们开始尝试有机种植、生态养殖，不断尝试着开发休闲农业等多元业态。为了形成规模效应、做好品牌化经营，村民们自发组建了生态农业合作社，分工合作，采购农资、共享技术资源、联合开拓市场。合作社制定了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把控规则，确保农产品的生态品质。这种经济上的协作，把原本分散的村民拧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以合作社为例，通过电商平台将生态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将赚到的利润按照一定比例分给村民，同时还会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建设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生态维护，让每个参与其中的村民都能切实感受到生态农业转型带来的收益，进一步增强了对社区经济共同体的认同感。

其二，生态农业转型还带动了社区管理共同体的形成。在转型过程中，生态农业的发展对社区的生态环境、公共秩序这些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民们也慢慢意识到，只有靠有效的管理和共同协作，才能保障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借鉴“村民自治”的理念，再结合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社区公约，这些公约里既有生态种植养殖的相关规范，也涵盖了公共资源使用、社区环境维护等多个方面。同时还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成员里有村民代表、农业技术能手，懂电商的能人，专门负责统筹协调社区里生态农业发展的各项事务，比如组织技术培训、监督公约落实、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等等。这种管理模式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大家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慢慢有了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管理共同体。比方说，针对农业生产里的生态保护问题，管理委员会组织村民定期开展环境巡查，对违规使用农药化肥的行为进行及时

制止并做好相关教育引导，既保证了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跑偏，也维护了社区的共同利益。

再者，生态农业转型还深化了社区文化共同体的内涵。生态农业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理念的传播载体。在转型过程中，社区会主动开展生态文化宣传活动，比如办生态农业节庆、开展农耕文化体验活动等，让村民们在参与中深入理解生态农业的价值，同时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融合。村民们在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内涵，将生态理念、合作精神融入进去。比如村里老一辈教年轻人传授传统农耕技艺时，同时也会灌输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社区里的孩子在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下，从小就树立起生态保护和社区共同体的意识。这种文化上的传承与创新，让社区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共同体，也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强化了文化认同感和情感纽带。

生态农业转型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塑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共同体给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动力，管理共同体为转型撑起了制度保障和秩序，文化共同体则为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居民从对土地的单一依赖，转变为对生态农业多元价值的共同追求；从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一个在经济、管理、文化等多方面紧密相连的社区共同体。这种重塑不仅让社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也展现了生态农业转型在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方面的巨大潜力。

7. 结语

从生态人类学“人-生态-文化”共生的核心视角来看，贵州喀斯特生态农业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是当地世居民族在脆弱生态基底与民生发展诉求之间，不断摸索平衡的实践过程，在传统农耕阶段，各民族群体依靠适应性作物种植与循环式畜禽养殖维系生计，将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深度融入民族文化体系；到了现代社会后，又借着政策扶持、市场导向和技术助力，逐步培育出有机种植、农文旅融合这类多元产业模式，最终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增收与文化遗产的价值协同。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始终离不开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深层支撑。区域内复杂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农业形态；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为产业发展筑牢了文化根基；而宏观政策引导与市场化机制又为其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外在活力。

喀斯特生态农业的演进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在理论层面，它更新了生态人类学领域对本土传统知识的认知范畴，也证明了传统生态智慧并非静态的文化遗存，而是能够适配脆弱生态系统的动态活态资源；在实践层面，其探索既为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破解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矛盾提供了可复制的贵州方案，也为全球同类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当然，当前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像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出现代际断层、资本过度介入引发的文化异化等问题，都对产业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制约。这也启示我们，喀斯特生态农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社区的主体地位，要以生态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为指引，推动社区群体主导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发展要素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效益轻生态、逐市场丢文化”的失衡问题，让贵州喀斯特生态农业在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cpc.people.com.cn/20th/BIG5/448350/448415/>, 2022-10-16.
- [2] 马贤惠.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关于贵州生态农业发展与建设的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 2002(4): 132-136.

-
- [3] 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80-81.
- [4] 马廷中. 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 48-53.
- [5] 马国君, 李红香. 生态文明视域下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探赜[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4, 16(3): 19-30+153.
- [6] 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 126-132.
- [7] 郝彧. 地方性知识生产与重构: 西南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85-94.
- [8] 伍应德. 基于生态环境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探讨[J]. 贵州农业科学, 2013, 41(8): 246-249.
- [9] 杨军昌, 李维嘉. 少数民族传统营林地方性知识对生态环境维护的——以清水江流域加池苗寨为对象[J]. 生态经济, 2019, 35(12): 215-221.
- [10] 顾久, 胡海琴. 中国生态人类学与贵州的生态价值[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3): 94-100.
- [11] 李戎朗, 汪磊. 喀斯特山地省区农民合作社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2): 146-152.
- [12] 朱映占, 魏婷婷. 西南山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多维实践及当代价值——以基诺族为例[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4, 16(5): 105-117, 155.
- [13] 王燕, 孙德亮. 贵州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初探[J]. 广东农业科学, 2013, 40(7): 208-210, 218.
- [14] 苏维词, 朱文孝. 贵州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构想[J]. 经济地理, 2000(5): 75-79.